

抗戰時期澳門《華僑報》“和”“戰”之爭

劉龍華 夏 泉

[摘要] 抗戰時期的澳門，成為孤懸海外的“中立區”。但是日軍和敵偽並未放鬆對澳門的“和平攻勢”，他們通過創辦偽報以及對澳門既有的主流中文報紙施加影響，宣傳所謂的“大東亞共榮”。為應對“和平攻勢”，《華僑報》開闢“讀者園地”欄目，讀者們圍繞“和”與“戰”的問題，展開了激烈論戰。通過論戰，澳門民眾對甚麼是真正的“和平”，“抗戰”的必要性及“抗戰”前途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日本和敵偽在澳門的“和平攻勢”。

[關鍵詞] 澳門 華僑報 和平攻勢 抗戰

全面抗戰爆發後，日本法西斯一再對中國進行“和平誘降”，以達成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汪精衛的出逃投敵可謂是日本誘降政策的初步“成功”，在汪精衛組建南京偽國民政府後，日本法西斯並未放鬆其和平攻勢。學界對戰時“和運”輿論反應的研究成果豐碩，^① 這些研究主要包括相關誘降政策在當時的運用及效果，以及當時主流媒體對日本“和運”的揭露與認識等。有關普通民眾對“和平誘降”政策認識的研究，似乎尚不夠深入。本文擬以抗戰時期澳門《華僑報》為主要文獻史料，^② 探究《華僑報》迫於日本及日偽勢力壓力，發表“和平”社論，後又在讀者壓力之下，開闢“讀者園地”欄目，讀者們圍繞“和”與“戰”的問題，展開了激烈論戰，從而使得澳門民眾對“和平誘降”以及“抗戰”的認識更為透徹。

作者簡介：劉龍華，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博士生；夏泉，暨南大學歷史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廣州 510632

① 相關主要研究成果：黃士芳：《汪偽的新聞事業與新聞宣傳》，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6年；余子道、曹振威、石源華、張雲：《汪偽政權全史》（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陳建新：《〈大公報〉與抗戰宣傳》，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王永恆：《媒體的力量——抗戰時期的〈新華日報〉及其影響》，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張繼木：《張季鸞抗戰言論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② 1937年11月20日，趙斑斕、雷渭靈受香港《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委派，在澳門創辦澳門《華僑報》。由於《華僑報》刊發的新聞較當時其他澳門的報導及時，很快發展為澳門的一份主流中文報紙。

一、抗戰時期澳門輿論環境

抗戰時期，葡萄牙一直保持“中立國”地位。澳門作為葡萄牙政府所管制的地區，在國際法的層面上獲得了不受中日兩交戰國侵犯的法律地位。因此，當內地戰事緊張之際，澳門就成為內陸民眾特別是廣東地區難民的重要避難場所（表1）。

表1 1924—1942年澳門人口總數表（單位：人）

年份	1924	1927	1937	1939	1940	1942
人口總數	190,306	157,175	150,000	245,194	374,737	450,000

資料來源：該表資料據莫世祥等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年）》，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347頁；古萬年、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索》，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年，第83頁；[葡]施白蒂著：《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1949）》，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83、289頁等資料整理而成。轉引自馮翠：《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華人社會——以慈善救濟為中心的研究》，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79頁。

抗戰的爆發及難民的湧入，也為澳門報業發展提供了契機。抗戰初期，澳門有《朝陽日報》、《大眾報》、《澳門通報》、《新聲日報》、《平民報》、《民生報》和《澳門時報》七家主流中文報紙，他們擔負起抗日救國宣傳的重任，貫徹抗日救國立場。由愛國報人陳天心創辦、曾枝西女士投資的《大眾報》和由愛國報人陳少偉斥資創辦的《朝陽日報》始終堅持着抗戰救國的立場，陳仲靄創辦的《新聲日報》也站在抗戰的陣線上，《澳門時報》的創辦人陸翼南以及《民生報》的創辦人文非一等以個人身份加入到抗戰的行列。只有極少數人因立場搖擺不定最終受日偽利用。由於《朝陽日報》和《大眾報》聯合發起組織救國社團和致力於救亡活動，在社會上享有頗高聲譽，因此無形中成為當時從事抗日救國宣傳的鮮明旗幟。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澳門新聞界鑑於國難當前，為支援抗戰，有加強團結的必要性。在當年9月，由文非一、陳少偉、陳天心、陳仲靄等聯同發起，組織“澳門新聞記者聯合會”，12月5日正式成立，會址位於《民生報》報社三樓，選舉陸翼南、文非一、陳仲靄、陳少偉、陳天心等為首屆理事，推舉資深老報人陸翼南為主席。澳門新聞記者聯合會為支援抗戰，曾與“各界救災會”等社團聯合舉辦遊藝大會義演，社會名流徐偉卿、梁彥明及報界前輩文非一等亦應邀登場，觀眾反應熱烈，籌款取得優異成績。

1940年，澳門政治情勢開始逐步惡化，一般戶外籌募救亡和宣傳活動被迫停止，同時數家報紙亦先後停版，加上經費支絀等原因，澳門新聞記者聯合會就此停頓。一部分新聞同業又於1941年夏，再次發動重組新聞界組織，易名“記者聯會”，響應參加者不多，雖成立但影響有限。其主要原因如下：一、當時出版的報紙僅三家，可說“買少見少”；二、1941年澳門的政治情勢持續惡化，不少報人無意再加入報業組織。因此記者聯會工作難以展開，成立僅半年左右，會務即出於停頓狀態中。^①

但日本侵略者仍對澳門施加了不少影響力。面對日方的壓力，澳葡政府在抗戰時期對新聞出版事業進行嚴格管制。從1938年起，全澳門的中文報紙均要在付印前將清樣送至澳葡政府華務

^① 陳大白：〈澳門新聞事業一頁奮鬥史——五十多年來光榮業績紀要〉，《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第155—156頁。

科屬下的新聞檢查處進行嚴格檢查，如有過激的抗日言論或對政府的批判，則嚴禁刊出，就連報紙上的廣告文字也不例外。到1939年，日方繼續向澳葡政府施壓，“禁止在澳門殖民地的華文報紙上刊登反對南京政府的文章”。^①1941年前後，漢奸劉傳能在澳門創辦偽報《西南日報》，為日軍侵略塗脂抹粉，宣傳所謂“大東亞共榮”。1941年8月20日，日本陸軍省發佈《對澳門施策要領》，其中在宣傳方面，要求澳葡當局“將遊行示威，反日言論以及結社等事，予以徹底取消”，“將中國報紙以及外文報紙中有關反日以及反國民政府（汪精衛政府）的言論、報導、電影、政治運動等事一律予以嚴厲取締”。^②1939年，日本向澳葡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不僅僅是中文禁止刊登反日言論，外文報紙亦不能倖免，遊行結社等事也不能進行。陳大白先生的記述也應證了此則史料。1942年起，澳葡當局的新聞檢查較前更為嚴苛，有時更因抽檢和留問（當晚未能放行）的稿件太多，以致當晚報紙無法排成完整一版，而在版面留出空白位，俗稱“開天窗”。^③

《華僑報》作為澳門抗戰時期的主流中文報紙，自然難以獨善其身。不僅要應對嚴苛的新聞審查，還要應對敵方勢力的施壓。1940年3月9日，趙斑斕在社論中向澳門新聞界同業進言，稱“澳門中國新聞記者，鑑於環境的需要，最近已加緊團結起來”，要團結一致完成報人的責任，最重要的是“我們雖或不能說出我們心裏所要說的話，但我們絕對不能造任何一方面的傀儡，或任何一方面的走狗，而說自己不願說的話，我們縱然不能報道真確的消息，但亦不能顛倒黑白，以虛偽的新聞欺騙世人，這是在不得已的環境中，最消極與最後的步驟”。^④《華僑報》既要堅守中立立場，亦不願“以虛偽的新聞欺騙世人”，同時也稱這是不得已的環境中“最消極與最後的步驟”。在此篇社論之後，直到1942年7月1日前，《華僑報》僅發表三篇社論。^⑤這三篇社論都還是“真確的消息”，然而《華僑報》最終還是走上了“最消極與最後的步驟”。

二、《華僑報》上的“和”論

（一）社論中的“和平”之聲

1942年7月2日的社論〈從新做起來〉是最早探討“和平”的文章，“如果用和平的方法，可以達到自由獨立幸福與富強，我們又何必必要從事戰爭，使千萬生靈塗炭”，而且“為着中日兩民族的前途幸福計，便不宜將仇恨加深，而應從事密切的合作”，之所以有這樣的主張，是“目睹同胞的流離顛沛，國力日作無畏的浪費，所以不得不痛陳利害”。為何《華僑報》會發出“和平”論調呢？可能確如其所述“不得不痛陳利害”，在此之前的兩三年，《華僑報》未刊登社論讀者會“加以原諒”。^⑥雖未明指究竟是甚麼原因，大致可以推論為新聞管制之故，但更可能是

① 《葛古諾訪日報告》，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2^aPA48，M217，轉引自金國平、吳志良：〈抗戰時期澳門未淪陷之謎〉，《澳門公共行政雜誌》（澳門）2001年第1期。

② 《「對澳門施策要領」に関する件》，陸軍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3340700。

③ 陳大白：〈澳門新聞事業一頁奮鬥史——五十多年來光榮業績紀要〉，《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第157頁。

④ 斑斕：〈為澳門同業進一言〉，《華僑報》（澳門）1940年3月9日，第1版。

⑤ 三篇社論分別為：斑斕：〈德外長訪義〉，《華僑報》（澳門）1940年3月11日，第1版；〈美德戰爭不宣而戰〉，《華僑報》（澳門）1941年9月13日，第3版；〈論澳門救濟工作〉，《華僑報》（澳門）1941年9月15日，第2版。

⑥ 斑斕：〈從新做起來〉，《華僑報》（澳門）1942年7月2日，第2版。

受到日特駐澳機關的壓力。時隔兩年多，再次刊發社論，且是頗為敏感的“和平”話題（表2），不至於僅僅是巧合。

表2 1942年《華僑報》主要“和平”社論^①

時間	篇名	時間	篇名
1942.7.2	從新做起來	1942.8.15	“妥協”不是“和平”
1942.7.7	五年了	1942.8.25	思想鬥爭
1942.7.8	保持主動	1942.9.9	中日戰爭前途
1942.7.10	中日和平的障礙	1942.9.18	“九一八”十一週年紀念
1942.7.13	血濃於水	1942.10.28	“中國問題之真正解決”
1942.7.14	一談態度	1942.11.5	言論自由
1942.8.2	捨正路而不由中日實難和平		

資料來源：由作者據《華僑報》1942年7月2日至1942年11月5日相關資料整理。

對於《華僑報》言論立場的轉變，有讀者就指出“甚至在去年七八月間，澳門的最大報紙《華僑報》，在敵寇的命令之下，還發表了一大套和平的理論”。^②面對讀者的質問，《華僑報》稱自己“並不諱敗為勝，使國民昧於真正的戰局”，而為了國家、民族和華僑的利益，就必須嚴格尊重澳門的“中立地位”。^③在“和平”問題的探討中，該報能否始終如一的堅持“中立地位”，而不會有所偏頗呢？

8月5日《華僑報》的社論雖強調“妥協”不是真正的“和平”，但又提出“中國是三民主義的國家，日本也是民治民享民有的國家，兩大民族應共同負起改造東亞的使命，爭取一個大同的世界”。^④《華僑報》仍以“大東亞共榮圈”理論為其分析工具，甚至將其與三民主義並論。或許因為讀者持續向《華僑報》施壓，該報表態“只要能達到自由平等的目的，我們願意肩負‘言論的十字架’，向荊棘途中，邁步前進”。^⑤《華僑報》認為其有言論鬥士的犧牲精神，並感歎“立論之難也”！^⑥但其之後的言論仍難以服眾。

論及中日戰爭前景，《華僑報》陷入十分消極的狀態：“如果戰事再延長下去，我們最後勝利馬上就來臨。這種信念雖是好的，但未免是幼稚和愚妄吧。”^⑦甚至認為中日之間對“九一八事變”認識的不同，是“由於對國家及民族觀念不同所致”，也“用不着再提起‘是誰之咎’的問題”。^⑧由此觀之，所謂背負“言論的十字架”就難以成立。

可能慮及社論的嚴肅性和代表性，加之來自讀者的質疑，《華僑報》在〈言論自由〉一文中為“言論自由”辯護後，^⑨直至抗戰結束，其社論基本未見“和平”論調。此種靜默，在某種程

① 〈從新做起來〉至〈一談態度〉，署名作者都是“斑斕”，即《華僑報》社長趙斑斕，其他未署名。

② 洪振：〈澳門：日魔掌心里的孤兒〉，《半月文萃》（桂林）1943年第1卷第11/12期，第48頁。

③ 斑斕：〈一談態度〉，《華僑報》（澳門）1942年7月14日，第2版。

④ 〈“妥協”不是“和平”〉，《華僑報》（澳門）1942年8月15日，第2版。

⑤ 〈言論公約〉，《華僑報》（澳門）1942年8月18日，第2版。

⑥ 〈思想的民主〉，《華僑報》（澳門）1942年8月26日，第3版。

⑦ 〈中日戰爭前途〉，《華僑報》（澳門）1942年9月9日，第2版。

⑧ 〈“九一八”十一週年紀念〉，《華僑報》（澳門）1942年9月18日，第2版。

⑨ 〈言論自由〉，《華僑報》1943年11月5日，第1版。

度上可視為一種抗爭。《華僑報》社論中的“和平”論調，清楚的表明該報受到來自日本駐澳特務當局和敵偽的壓力。如慮及當時澳門的“中立”地位和此時的政治社會環境，仍不能簡單地對《華僑報》“蓋棺定論”。其一，此一時期，《華僑報》在澳門的“歸僑運動”中發揮着重要的組織和宣傳作用。^①其二，如果《華僑報》堅決抵制敵偽的壓力，那就很可能步其他中文報紙之後塵，被迫停刊，從而使得《西南日報》在澳門戰時中文報紙中一家獨大。因此，《華僑報》社論中的“和平”論調，故無可取之處，但維持報社運營，為“歸僑運動”發聲，為澳門民眾提供正面的抗戰資訊，就不難看出《華僑報》的苦衷。

（二）敵偽侵略理論宣傳

早在“讀者園地”欄目開闢之前，就有人以“讀者”名義在“特載”欄目上發表“和平”理論的宣傳文章。最早的一篇為〈民族的變態心理〉，認為中國朝野抗戰的最大原動力為“及汝皆亡”的心理，^②文章作者將國人的抗戰精神貶斥為“及汝皆亡”，而完全忽視了抗戰精神的內核“保家衛國”。如果說布衣的論述還不那麼諂媚，那麼筆名為雲飛的作者在1943年初所發表的有關日本“和平”理論的幾篇文章，就不能不令人警醒。其〈中日怎樣消除仇恨〉一文稱，日方迫於英美的競爭壓力而侵略中國，表示“同情”和“理解”，還將日本的“八紘一宇”侵略思想與中國的“世界大同”相提並論。^③這篇以中國人名義寫的文章，無疑是在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徑進行辯護和粉飾。

不僅如此，雲飛還大肆誇讚日軍的作戰精神，“日本海陸軍人作戰犧牲的勇敢，實屬可歌可泣”。^④〈甚麼是共榮圈〉一文，闡釋了所謂“共榮圈”提出的歷史必然性，進而認為“東亞共榮圈是東亞民族的共榮圈，而不是日本本位的東亞共榮圈”。^⑤“讀者園地”欄目開闢之後，布衣和雲飛又在該欄目上發表〈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戰力〉系列文章，宣傳“中日提攜”和“東亞共榮圈”的侵略理論。^⑥署名王天民的作者諂媚的表示“中國人如果願意，以後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因為我們的緊密合作，而不知不覺地變為願意與日本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地做一個共榮圈的分子。供給日本人所缺乏的物力、勞力和人力去參加大東亞戰爭，以‘增強日本的實力’，俾得對‘日本的目的有所貢獻’，則中日和平當可實現”。^⑦如果說雲飛的文章還有所掩飾，那王天民的言詞則盡是奴顏婢膝的醜惡嘴臉，毫無羞恥之心。

若以《華僑報》社論〈從新做起來〉為起點，敵偽對其滲透可追溯至1942年7月。若以布衣的〈民族的變態心理〉為起點，敵偽對《華僑報》的滲透，至少可以追溯到1943年1月13日，或謂

① 從1942年3月到1943年2月，《華僑報》以及澳門社會各慈善團體組織“歸僑運動”，說服來澳難民回鄉，使得戰時難民潮帶給澳門的壓力逐漸減小。《華僑報》不僅發揮重要地組織和宣傳作用，還在代收善款等工作上為歸僑運動作出重大貢獻。詳見馮翠：《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華人社會——以慈善救濟為中心的研究》，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183—209頁。

② 布衣：〈民族的變態心理〉，《華僑報》（澳門）1943年1月13日，第2版。

③ 雲飛：〈中日仇恨怎樣消除〉，《華僑報》（澳門）1943年2月9日，第5版。

④ 雲飛：〈談思想戰〉，《華僑報》（澳門）1943年2月20日，第2版。

⑤ 雲飛：〈什麼是共榮圈〉，《華僑報》（澳門）1943年3月12日，第2版。

⑥ 布衣：〈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抗戰力量〉，《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3日，第2版；布衣：〈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抗戰力量（二）〉，《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23日，第2版；雲飛：〈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抗戰力量（三）〉，《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23日，第3版。

⑦ 王天民：〈共榮圈與中日和平〉，《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6日，第2版。

敵偽進一步加強對《華僑報》的滲透。^① 此種觀點較為可信，其一，從這篇〈民族的變態心理〉開始，《華僑報》上的敵偽文章，大多都比較直白，甚少粉飾；其二，就是此時間節點是在汪偽南京國民政府向英美宣戰之後，汪偽宣傳部即制定編撰〈關於參戰的宣傳要點〉和〈參戰宣傳計劃〉等配套宣傳文件，^② 為其參戰和“和平建國”作進一步宣傳。由於直接史料的缺失，尚不知敵偽勢力是如何直接影響到《華僑報》。但從《西南日報》社長劉傳能的相關史料可略作管窺。劉傳能曾作為“中方代表”，出席1941年8月舉行的“東亞新聞記者大會”。^③ 會議的目的在於動員東亞新聞界為“闡揚東亞新秩序，建設思想，而與彼維護舊秩序者戰……為東亞文化之融合者創造，盡其最大之努力”。^④ 作為代表，劉傳能在《西南日報》盡其宣傳“東亞新秩序”之能事。然而，如能影響《華僑報》乃至澳門新聞界，自能事半功倍，他至少部分地達到了此目的。《華僑報》稱劉傳能“為人正直，對社會不平事件，時作正義呼聲，新聞協會之成立，厥功最偉”。^⑤ 正如陳大白所言，“當年劉傳能、陳昌文仰承其主子之命”，重新改組“記者聯會”，並易名“澳門新聞協會”，且在暗中展開活動，最終實際控制了“澳門新聞協會”。^⑥ 由此可知，劉傳能很可能充當向《華僑報》直接施壓的推手，通過控制“澳門新聞協會”進而影響《華僑報》。

（三）讀者對“和平”的認識

《華僑報》在1943年3月開闢“讀者之聲”（後改為“讀者園地”）欄目，接收各類讀者投稿，不論是主和還是主戰的文章，大多能得到發表，其中的是非曲直則留待該報讀者去評判。^⑦ 這可能是敵偽“和平攻勢”策略上的轉變，抑或是《華僑報》“言論鬥士”精神的再度萌發。但不論是哪種原因，《華僑報》上可以刊載讀者的“抗戰”文章，就是明顯的進步（表3）。

表3 讀者之聲、讀者園地“和”“戰”文章統計（1943年3月至8月）

序號	時間	作者	持“和”文章	時間	作者	持“戰”文章
1	1943.3.22	吳達人	東亞和平曙光已現	1943.3.26	羅瑛	讀吳達人先生“東亞和平曙光已現”後
2	1943.3.31	張魯	論國際形勢——為和戰問題而作	1943.4.1	蘇復中	和與戰
3	1943.4.4	吳達人	一個答覆	1943.4.3	若行	中日攜手的問題
4	1943.4.8	李素之	解鈴還須繫鈴人	1943.4.12	後生	怎樣“和平下去”
5	1943.4.10	遙遙	最後一擊又如何	1943.4.14	漁唱	不可忽視的“爭取民意”
6	1943.4.11	禪音	逆耳的論調	1943.4.17	羅瑛	國人對於和與戰應有的認識——並答覆張魯先生之問

① 布衣：〈民族的變態心理〉，《華僑報》（澳門）1943年1月13日，第2版。

② 汪偽政府宣傳部：《關於參戰的宣傳要點》，汪偽政府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③ 〈東亞新聞記者大會出席列席代表名錄〉，《東亞新聞記者大會特輯》，南京：惠文印書館，1942年，第13頁。

④ 〈東亞記者大會宣言〉，《東亞新聞記者大會特輯》，南京：惠文印書館，1942年，第4頁。

⑤ 〈人事篇〉，《澳門〈華僑報〉六周年紀念手冊》，華僑報社，1943年，第6頁。

⑥ 陳大白：〈澳門新聞事業一頁奮鬥史——五十多年來光榮業績紀要〉，《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第160頁。

⑦ 〈小故事〉，《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3日，第2版。

(續上表)

7	1943.4.13	布衣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抗戰力 (譯文)	1943.4.18	雷萬里	中國需要真正的和平
8	1943.4.15	趙司馬	為《論國際形勢者》補充幾句	1943.4.20	朱加	現在呼籲和平的人，是真正愛好和平的嗎？
9	1943.4.16	王天民	共榮圈與中日和平	1943.4.24	娛幸	為《讀者園地》而作
10	1943.4.23	布衣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抗戰力量 (二)(譯文)	1943.5.1	力言	着論壇
11	1943.4.23	雲飛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抗戰力量 (三)	1943.5.6	潔貞居士	天祚中國
12	1943.5.11	李友亮	請教我們的父兄前輩	1943.5.7	譚楓	也是“和平問題”
13	1943.5.17	方子超	我也談一談和與戰	1943.5.15	張伯謙	寫給一位少年
14	1943.5.20	羅作藩	亞洲的諸葛孔明何在？讀李友亮與張伯謙的文章後	1943.5.19	木華子	與李友亮君進一言
15	1943.5.24	羅作藩	中日都需要真正的和平	1943.5.26	秉口	只有戰爭可以解決戰爭
16	1943.5.30	謝天理	何以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	1943.6.14	黃廣	和李君談談
17	1943.6.5	李友亮	再來一次請教	1943.6.23	蕭守堅	我們需要爭取正義的和平，和戰後的自由平等
18	1943.6.12	布衣	怎樣才算真正的和平	1943.7.28	毛考祥	問問日本的中國通們
19	1943.6.29	弱水	大家想想	1943.8.3	朱耀德	中日戰爭如何結束(上)
20	1943.7.5	黃浩然	大家請再想想	1943.8.4	朱耀德	中日戰爭如何結束(下)
21	1943.7.7	弱水	再想想之後			
22	1943.7.30	張浩然	我也來談談中日和戰問題 (上)			
23	1943.7.31	張浩然	我也來談談中日和戰問題 (下)			

資料來源：由作者據《華僑報》1943年3月22日至1943年8月4日相關資料整理。

讀者間的“和”“戰”論爭，大致以吳達人1943年3月22日的〈東亞和平曙光已現〉為開端，以1943年8月4日朱耀德的〈中日戰爭如何結束(下)〉為結束，持續近五個月，而此番論戰能在澳門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為達到“和平”的目的，敵偽很可能以“讀者”身份繼續發文，其中最典型的要屬吳達人，他的一篇〈東亞和平曙光已現〉的文章，掀起了《華僑報》讀者“和”與“戰”的激烈論爭。該文主要論點如下：一、“報怨以德”，中日應相忍相讓，然後可以共存共榮；二、中日戰爭，是他國的挑撥離間，使我們兄弟之邦打鬥起來；三、中國如果再戰六年，會從吃素的馴牛變作飲血的惡魔，獸性的發現不只會消滅東亞，甚至毀滅人類；四、中日兩大民族的攜手聯歡，是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石。^① 中國遭受了日本近六年的侵略，吳達人也從香港逃亡到澳門，然他竟然認為自己的同胞會因為戰爭而成為飲血的惡魔，希望中國人民“報怨以德”，與日本民族“攜手聯歡”。不論是情感還是理智上而論，這篇文章的“和平”觀點難以為一般讀者所接受。不久，讀者羅瑛撰文嚴厲駁斥吳達人的謬論，強調戰爭責任在日本，中國抗戰之正確，而羅瑛最為擔憂的則是普通讀者不察，而為“和平”言論所煽惑，妨礙抗戰前途。^② 很快此種擔心就得以應驗，

① 吳達人：〈東亞和平曙光已現〉，《華僑報》（澳門）1943年3月22日，第1版。

② 羅瑛：〈讀吳達人先生《東亞和平曙光已現》後〉，《華僑報》（澳門）1943年3月26日，第1版。

讀者張魯認為就盟國援助中國的國際形勢而言，中國的抗戰是在盲目浪費國力，是在“替人家打仗”，在日本“揭起東亞民族團結之旗”之時，希望日本“以平等待我”。^① 讀者張浩然看到“同文同種”的英美捨棄昔日同盟之國而相互合作，故“同文同種”的中日兩國雖“兄弟鬩於牆”，也應該“外禦其侮”進行合作。^② 可見羅瑛的擔憂不無道理，在國民素質參差不齊並有大量文盲存在的社會裏，加之敵偽“讀者”混淆視聽，普通讀者可能對輿論缺乏基本的判斷分析能力。因此“和”論，特別是假以日本“和平”理論外衣的“和論”，極具迷惑性，戰時中國國力又遠不及日本，由此產生的言“和”輿論在澳門公共輿論領域也有着一定市場，並形成一定負面影響。

昧於抗戰形勢的“和平”論。羅作藩提出“中國民族至死不屈，苟有以屈辱代和平，重慶抗戰政權必與之戰至同歸於盡”，可又認為“偉大的政治家在必要時可以認敵為友”，並以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為例予以證明，強調中日間應出現“孔明”類的人物以消弭戰爭。^③ 署名老農的讀者認為歐戰的結局，不論怎樣對中日都是不利的，應該“趁着現在這個機會去謀和平”。^④ 高中生李友亮，因為受不了戰爭期間的顛沛流離和家人離散之苦，所以希望“和平”早日到來。^⑤

綜上可知，此一時期，在《華僑報》上談“和平”的不僅有《華僑報》的編輯，也有澳門普通民眾，更有敵偽勢力。只是，由於各自出發點不同，他們關於“和平”的認識，也就有着顯著的差異。《華僑報》編輯想談“和平”，則必須面對各方的壓力，包括敵偽和讀者。讀者談“和平”，則壓力略小，但也有部分“讀者”的身份是高度值得懷疑的。敵偽談“和平”則肆無忌憚。面對澳門社會甚囂塵上的“和平”論調，堅持抗戰的讀者也希望及時發出自己的聲音，批駁“和平”言論以堅定“抗戰到底”的決心。

三、《華僑報》上的“抗戰”呼籲

“和平”攻勢使澳門部分民眾產生了困惑，但《華僑報》以及部分讀者及時站出來發聲，表達對“抗戰到底”的支持，提出民心是抗戰勝利的有力保障，不應過度依賴盟國援助，“自力更生”則是抗戰取得最後勝利的根本有效途徑。

（一）社論中的“抗戰”

除開闢“讀者園地”欄目、為讀者創作的抗戰文章提供發表平台之外，《華僑報》也適時在社論中流露出對抗戰的支持，其主要在如下方面表現：

第一，關注國內局勢。〈戰時的生活〉一文，盛讚前方抗日戰士“惡戰苦鬥”，後方的勞動者“埋頭苦幹”。文章批評道，與此種抗戰精神不相匹配的是大後方許多有錢人“盡情於物質的享受與肉慾的歡狂”。^⑥ 1942年12月，何應欽就任駐印中國軍隊總司令，雲南省主席亦兼任滇西

① 張魯：〈論國際形勢——為和戰問題而作〉，《華僑報》（澳門）1943年3月31日，第4版。

② 張浩然：〈我也來談談中日的和戰問題（下）〉，《華僑報》（澳門）1943年7月31日，第4版。

③ 羅作藩：〈亞洲的諸葛孔明何在？讀李友亮與張伯謙的文章後〉，《華僑報》（澳門）1943年5月20日，第2版。

④ 老農：〈歐戰結局以後謀和平與現在謀和平，比較起來哪一個對中國為有利呢？〉，《華僑報》（澳門）1943年7月23日，第2版。

⑤ 李友亮：〈請教我們的父兄前輩〉，《華僑報》（澳門）1943年5月11日，第3版。

⑥ 〈戰時的生活〉，《華僑報》（澳門）1942年11月12日，第1版。

軍總指揮，這都是對戰局影響頗大的人事任命。《華僑報》評論道，“中國抗戰，在求中國之獨立與自由，不為他人作嫁衣裳”，我們希望“何總司令與龍雲總指揮到達前線後，對於‘把握印度’與‘奪回緬甸’致其最善之努力”。^① 這樣的言論已經與此前散播敵偽“和平”理論大異其趣，《華僑報》基本立場已站在重慶國民政府這邊。除關注國內形勢外，《華僑報》亦深知國際援助對中國抗戰的重要性，此一時期的社論文章對盟國援華工作發出呼籲和建言。

第二，關注盟國戰場與爭取盟國援華。1942年底，盟軍開始進攻緬甸，《華僑報》看到其對緩解滇西中國軍隊的壓力，盟軍向緬甸推進，“可以緩和日軍對滇的壓力”，“更可與中國軍隊合力進攻，以收夾擊之效，而打通滇緬路之運輸”。^② 1943年2月26日，時任外交部長宋子文在美發表談話，希望美國予以援助更多飛機。《華僑報》指出“中國的抗戰不僅為自身，同時也為了盟軍而戰”。^③ 隨着戰局進一步向盟國方向發展，盟國反攻日本計劃的制定也日益迫切。《華僑報》建議盟國“應以大量武器運往中國，以支持中國實力。並利用中國的據點，以強大的空軍配合中國之強大陸軍，實行反攻”。^④ 《華僑報》在關心盟國戰局發展的同時，一直呼籲盟國加強對華援助，並闡釋援助之緊迫性與必要性。無疑，這些言論表明《華僑報》大多時候是以中華民族利益為根本前提的，為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澳門的宣傳作出重要貢獻。

（二）嚴厲批駁“和平”言論

在羅瑛之後，又有不少清醒的讀者站出來批評吳達人的言論。讀者“後生”的批駁最為系統，他指出除汪精衛贊同“和平”之外，舉國上下堅決拒絕，即便之後日本發動了幾次“和平攻勢”，中國政府長期抗戰的國策也未發生動搖。至於中國為甚麼一直拒絕日本所謂和平的原因，則是“日本希望我們中國接受它的‘和平’，但我們中國則必須在領土主權絕對完整的原則下始願與日本談‘和平’，所以中日之間只有戰，不能和”。另外“日人攻華六年來損失的浩大，誰也知道他們怎能甘心放下我們中國回到扶桑三島去？因此對於這樣的“和平”，我們就該“停口”，更不要被“和平”迷惑了心眼，而鬆懈了“我們持久的戰鬥”。^⑤ 該文對“和平”的認識可謂一針見血，戳穿日本“和平”的外衣。

而羅瑛在撰文批駁吳達人之後，卻遇到張魯所謂的“請教”。對此，羅瑛不得不回擊張魯對自己的指責，並就張魯“中國抗戰浪費國力”的謬論答覆道：“中國是為自衛生存而戰，並不是替人家作戰。充其量只可說與盟國並肩作戰，中國所需的是自力更生自作□□，並不應有任何賴外力的心。同時在各賢明長官領導下，國力是有相當的消耗，但並未嘗作盲目的浪費。”^⑥

因此，僅僅簡單地批評“和平”言論，指斥其“煽惑普通讀者，不利於抗戰”，似乎並不足以讓在澳門的中國民眾看到“和平”真正的曙光。只有讓讀者們認識到抗戰的必要性，以及抗戰勝利的“取勝之匙”，身處“中立區”的民眾方可在艱難的時局下，看到堅持下去的希望和對未來的憧憬。

① 〈勸何應欽龍雲兩氏〉，《華僑報》（澳門）1943年1月4日，第2版。

② 〈盟軍進入緬甸〉，《華僑報》（澳門）1942年12月29日，第1版。

③ 〈盟國重視東方戰場〉，《華僑報》（澳門）1943年5月25日，第1版。

④ 〈遠東決戰繫於中國〉，《華僑報》（澳門）1943年8月14日，第2版。

⑤ 後生：〈怎樣“和平”下去〉，《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2日，第2版。

⑥ 羅瑛：〈國人對和與戰應有的認識——並答覆張魯先生之問〉，《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7日，第2版。

（三）民心是抗戰勝利的保障

得民心者得天下，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戰爭，更是如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和戰”論戰中，蘇復中是第一個全面分析抗戰必要性和抗戰勝利希望的作者。^①在〈和與戰〉一文中，他指出“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就是中國簡單的和平條件”，但是日本卻不肯讓步，因此“唯一的生存出路就只有戰爭”。在戰爭中，許多人看到帝國主義的種種滑頭措施，就搖頭表示“我們既受他傳統政策所影響，幾乎是不可挽救的了”。面對這種悲觀情緒，蘇復中在文章當中鼓勵人們“廣大的人民和土地中，卻潛藏着一種偉大而不可動搖的實力”，並舉紅軍長征的實例進行論證。^②蘇復中所強調的力量就是人民群眾的力量。第一個站出來批駁“和平”言論的羅瑛，亦強調“繼續抗戰，不患人力物力之不足，而患民氣之不堅定”。^③

（四）提倡“自力更生”

澳門同胞認識到中華民族的抗戰有賴於人民群眾的力量，於此同時，他們也深刻意識到“倘若更得聯合國家的盡力援助，勝利的曙光就照遍整個的大地了”。當然更為清醒的認識是“無論環境怎樣的對我們有利，我們到底還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抗戰初衷，不要依賴他人，才能得到自由平等的獨立”。^④

為甚麼要本着“自力更生”抗戰意識呢？有論者認為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各國都各為自己的利益打算，誰都不會真心誠意的幫着誰”，所以中國抗戰只能靠自己。^⑤“六年來的過程，哪有過多大的幫助，……所以中國的自衛戰鬥，是不會仰人鼻息的”，這位作者也強調抗戰是建立在“我們一般人民之上”。^⑥

澳門民眾對盟國援助缺乏信心，並不是空穴來風。1942年中期開始，英美就逐步確立“歐洲第一，亞洲第二”的戰略，先着力解決德意法西斯，再集中精力對付日本法西斯。加之盟軍援華的重要路線——滇緬路中斷後，盟軍援華物資由數萬噸降到數百噸。^⑦不論從戰略方面考慮，還是實際的援助來觀察，似乎盟國不願全力支援中國的抗戰，故讓澳門民眾萌發“自力更生”的思想。

當然澳門民眾對此種戰略的認識，畢竟是短視的，從整個二戰戰局觀之，此時盟軍作出這樣的決定是有利於戰事發展的，但這個前提是中國必須在東方拖住日本法西斯。澳門讀者譚楓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假如沒有中國拖住了日本的尾巴，太平洋上的決戰，英美是難保證勝利的”。^⑧毛澤東也是支持盟國的這一戰略決定“打倒了希特勒，解決日本便會是很順利的了”。^⑨

倡導“抗戰到底”的澳門民眾，當然期望和平的到來，但他們認識到，日本和（汪偽）南京國民政府的“和平運動”，實乃“緣木求魚”。^⑩他們大多持這樣的觀點：“和平並不是天上

① 蘇復中可能是當時在澳門的中共黨員或支持同情中共的澳門人士，其名字“蘇復中”，有用蘇聯模式恢復中華之意，且文章當中所舉的案例則是紅軍長征，故做此推論。

② 蘇復中：〈和與戰〉，《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日，第2版。

③ 羅瑛：〈國人對和與戰應有的認識——並答覆張魯先生之問〉，《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7日，第2版。

④ 蘇復中：〈和與戰〉，《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日，第2版。

⑤ 趙司馬：〈為《論國際形勢者》補充幾句〉，《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5日，第2版。

⑥ 若行：〈中日攜手的問題〉，《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3日，第2版。

⑦ 〈盟軍放棄反攻緬甸嗎〉，《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21日，第1版。

⑧ 譚楓：〈也是“和平問題”〉，《華僑報》（澳門）1943年5月7日，第2版。

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英勇鬥爭的二十二年〉，《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頁。

⑩ 謝天理：〈何以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華僑報》（澳門）1943年5月30日，第2版。

掉下來的，而是需要我們從戰爭中去努力爭取的，總之，我們得讓戰爭自己去求和平的解決，其實只有從戰爭中去解決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光榮的和平。”^①另外，《華僑報》上的“和”“戰”論爭，也引發澳門另一家中文報紙——《大眾報》的共鳴，並發表若干篇社論，揭露敵偽的“和平”是“不徹底的和平，是虛偽的和平”。^②可見，“和”“戰”論爭，已不限於《華僑報》一家，在澳門社會產生了一定影響力。

其實，自汪精衛投敵之後，其所控制的報紙就進行過所謂的“和戰問題”討論。典型代表之一是胡蘭成在香港《南華日報》上組織讀者就“和戰問題”進行討論，大力宣揚“和平建國”、“再戰亡國”的賣國論調，並將“讀者”文章編輯成冊，繼續宣傳。^③另一典型代表是汪偽機關報《中華日報》，該報在1939年7月復刊後不久，即開闢“讀者呼聲”、“讀者論壇”欄目，為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搖旗吶喊，反對“抗戰建國”，甚至吹噓汪精衛為“不計抗戰論者之譏諷，忘其今人之榮辱……惟努力於國家之復興，救人民於水火之中”的政治家。^④但是這兩家報紙所組織的“和戰問題”討論，“讀者”所發表的文章無一例外都是積極回應“和平建國”，而無支持“抗戰”乃至反對“抗戰”，他們的所謂“討論”也就成汪偽的一言堂。^⑤與之相對比，澳門《華僑報》上的“和戰論爭”，不僅有“和平”文章，更有大量支持“抗戰到底”和批駁“和平運動”的文章。由此而論，在澳門艱難的輿論環境下，《華僑報》的確是有所作為，不能因其刊載“和”論文章，而妄下定論。

結語

據《華僑報》歷史資料庫，可大致認定，《華僑報》在1940年3月9日之前，其在社論中表現出來的立場，基本上能站在中華民族的利益上，是無可指摘的，可稱之為民族大義時期；1940年3月9日至1942年7月2日間，幾無社論發表，可稱之為完全中立時期；1942年7月2日至1943年8月4日，發表的社論及其他相關立場鮮明的文章，掀起“和”“戰”之爭，可稱之為抗爭圖存時期；1943年8月4日至1945年8月15日，其社論中的文章大多偏向中國抗戰，可稱之為未完全中立時期。

抗日戰爭攸關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每一位炎黃子孫都難以獨善其身，即便是“孤懸海外”的“中立區”澳門亦如是。日本法西斯除了注重軍事方面的行動外，對新聞宣傳亦非常重視。^⑥上文所引日本陸軍省的文件《對澳門施策要領》，可知日本對澳門施加了直接的影響。《華僑報》刊登的所謂“和平”理論的文章，可間接證明此點。另外，署名雲飛、布衣等人的“和”論文章，之後竟未有直接批駁的文章，這足以說明《華僑報》受到巨大的外部壓力。面對壓力，

① 後生：〈怎樣“和平”下去〉，《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2日，第2版。

② 〈和平的真諦〉，《大眾報》（澳門）1943年9月15日，第1版。

③ 南華日報社編輯部編輯：《續和戰問題之討論》、《再續和戰問題之討論》，香港：南華日報社，1939年。

④ 鄧心旦：〈政治家與英雄〉，《中華日報》（上海）1939年10月6日，第1張第3頁。

⑤ 有論者指出，《南華日報》的“和戰問題”討論，着重鼓吹的是“中國目前與日本謀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華日報》的記者和編輯用假名冒充讀者，“發出響應和擁護汪派‘和運’的‘呼聲’”。參見余子道、曹振威、石源華、張雲：《汪偽政權全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3、857—858頁。

⑥ 佐佐木健兒：〈新中國的新聞通訊問題〉，《華北新聞記者講習會講義錄》，1940年，第2頁。（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華僑報》通過刊登批判“和”論的文章以及堅持“抗戰”的言論，以彰顯自己“中立”立場。

抗戰時期中國國力遠不及日本，在日本的“和平”攻勢下，部分澳門讀者僅看到眼前的緊張局勢和生活的日益窘迫，悲觀情緒在這部分讀者中蔓延滋長，他們極度渴望“和平”。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和平”論者的身份，他們是真讀者還是漢奸文人？抑或兼而有之？以目前的資料尚難作出區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無論“和平”論者是誰，他們的言論都會帶來極大危害，如羅瑛所言“對我國抗戰前途，大有妨礙”。

“和平”問題，在抗戰時期的中國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在國統區和大後方“抗戰到底”是政治正確的基本要素，在淪陷區“和平建國”是政治正確的基本要素，“抗戰到底”與“和平建國”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相互排斥，難以共存。“中立區”澳門《華僑報》標榜以“中立”立場辦報，不僅“抗戰到底”和“和平建國”的言論都有發聲空間，還產生頗為激烈的論戰，這是在國統區和淪陷區所難以見到的現象。通過對“中立區”澳門的輿論考察，更能真切地觀察國人對“抗戰”和“和平”認識的真實想法，畢竟國民政府對澳門的影響力有限，民眾在發表相關想法時，顧忌的因素相對較少。即便如此，通過這場論戰，身處澳門的各界民眾積極批判“和平”言論，堅定“抗戰”信心，最後對甚麼是真正的“和平”，以及“抗戰”的必要性和“抗戰”前途有更清晰的認識，清楚地認識到“日人一日不退出中國，我們也一日沒有和平”。^①這彰顯出中華兒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表明澳門民眾的抗日救亡意識沒有因為置身戰火之外有所減弱。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蕭守堅：〈我們需要爭取正義的和平，和戰後的自由平等〉，《華僑報》（澳門）1943年6月23日，第2版。